

1948年11月，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杨延修等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与陈果夫合办药厂“一箭双雕”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频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开拓,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更多西药将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这时,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1946年8月15日,广大药房在广东路389号举行盛大开业仪式。杨延修兼任经理,他忙着接待前来祝贺的社会名流和医药界头面人物,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由他坐镇,那些小流氓躲在一边,根本不敢趁开张之机来“敲竹杠”。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为之很振奋: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



■ 1946年8月15日,上海广大药房开幕纪念(前排左五为杨延修,左六为卢绪章)

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颌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病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这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号有块面积3亩多的空地廉价求售,杨延修说动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兴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兴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



■ 中兴制药厂创立会签到笺上,陈果夫、杨延修等人的签名

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

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

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

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自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

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年起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50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明100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50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20根金条,都是我们从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

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20.名角卖汤圆

筱文艳与倪春香合伙跑单帮,实际上只是做个帮手。到了浦东,筱文艳看住塌车,倪春香穿宅走村,把买来的货物装上车后,她就帮着推上摆渡船,悄悄运回来。有的时候不用塌车,把米装在裤脚里、衣袖里,偷运过江。到了浦西,货物也全由倪春香出手。赚来的钱,两人平分。这些事情倪春香一个人就可以做,是她讲姐妹义气,想帮助筱文艳增加一点收入。

那时,码头上有日本兵把守,如果被他们发现,就有杀头的危险。倪春香十分机警,几次遇到日本兵时都能逢凶化吉,巧妙地躲过。当筱文艳的公婆知道她在提着脑袋跑单帮时,又来“干涉”了,筱文艳也只得就此歇手。但是,自己与倪春香的患难姐妹之情,至今铭刻在她心上,从此两人间往来不断。

1943年年底,民乐大戏园又改唱淮剧,筱文艳回到那里再度登台。刘大麻子还是将剧场出租,老板是一位姓陆的。1944年到1945年的两年间物价飞涨,局势越来越差,筱文艳一个月的包银只能买五副大饼油条,一家人的生活又陷入困境之中。生存是第一位的,筱文艳也顾不得什么名角不名角了,她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每天早上就忙碌在小摊前,洗碗、收钱、盛汤圆,什么事都干。一个名角在卖汤圆,自然引起人们的好奇,生意多多少少会好一些。有的顾客每日光顾,也有一些油头光棍、流氓地痞涉足摊头,存心不良。筱文艳对此早有准备,她非但不涂脂抹粉,还故意蓬头垢面,一副让人不敢侵犯的架势。存心不良者占不到一点便宜,也揩不到一点油水。夜戏散场之后,筱文艳还要帮公婆磨面粉。

1945年初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筱文艳应邀到嘉兴去演出。嘉兴在浙江省东北部,东靠上海,南临杭州湾,是浙北唯一的出海口,水运特别发达,水陆码头上的运输工人,大多是苏北老乡,他们渴望能够看到家乡戏。于是就委托淮剧演员华美琴的爱人倪少鹏组织班子。倪少鹏的活动能力很强,一下



子组织了一支阵容颇为强大的演员队伍,除了筱文艳之外,还有李玉花、陈为翰、梁光义等演员,加上乐队共有五十多人。

从上海到嘉兴,乘的是火车。筱文艳怀抱两周岁的儿子双喜倚窗而坐,眺望着窗外的江南水乡,不由得思绪万千。她,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靠自身的努力,在舞台上挣得一碗饭吃,但身心的疲劳,生活的重担,常常压迫着她,让她想挣开缚束,长长地舒一口气。离开了喧嚣的大城市到乡下去演出,她正好借此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调整一下心态,恢复体内的生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离开上海到外地做较长时间的演出,新鲜感与陌生感交织在一起,同时也担心到嘉兴唱戏,会因人生地不熟而没有观众。

火车停靠嘉兴,前来迎接的乡亲们一下子围住了他们,都操着一口苏北话,仿佛此地不是浙北而是苏北,驱散陌生,拉近距离,这使她心里宽慰了不少。嘉兴的剧场叫星明大戏园,据说是为了敬“大仙”而集资建造的,每月的初二和十六,不少当地的农民到剧场里来烧香。这剧场规模很大,有一千多个座位。他们顾不得路途疲劳,也顾不得一夜间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第二天就开锣唱戏。唱的是《秦香莲》《龙凤呈祥》等剧目。

锣鼓一响,在嘉兴的苏北老乡奔走相告,呼朋唤友,前来看戏。当地的市民和附近的农民,听到上海的剧团来唱戏,也不问是什么剧种,纷纷购票,出现了场场满座的盛况。剧场老板也笑容满面,乐不可支。

可是,没过几天,日本人的飞机在嘉兴上空不时地俯冲掠过,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一时间谣言四起,都说这里要打仗了。城里人纷纷逃往乡下,剧场老板连招呼也不打,就不知去向。原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的垂死挣扎,由于当地消息不灵通,民众误以为要打仗了,因此引起一场混乱。老板一跑,剧场没有主事的人了,在剧团也引起了混乱,有些人主张回上海,有些人主张留下来看看形势再说。筱文艳虽然不是领班的,但是她在这个集体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因为她是头牌花旦,是支撑临时班子的大梁,也因为她为人老实、不会耍奸,得到人们的信赖,在去留的问题上,大家都在等她的一句话。

25.已经在心里呼之欲出了

袁朴生难得地笑了。说,为什么要你们反复捶打这么一张泥片呢?做急须的人,难得的是内心有一种定力。乾坤之大,皆在吾手;悠悠万事,唯吾独尊。只有在反复捶打泥片中,这种心态才能练出来。你们看看,经过了三天捶打的泥片,跟三天前是一样的吗?完全不一样了!再就是,紫砂泥里面有空气,应该把它们挤掉;只有反复捶打,空气才能无影无踪;如此,泥片的韧劲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袁朴生举起那张打好的泥片,它像刚磨好的面皮,托在手上,让人感到它的确蛮有韧劲。今后你们会知道,对于制作一把急须来说,一张厚薄均匀的泥片,是何等重要。接下来,袁朴生告诉大家,他打的这张泥片,将会做出几把很小巧的急须来。

制壶的那天,古子樱的父亲老三岛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位老者,分别是附近几个窑口的掌门。他们端坐在一旁,目光复杂,神态矜持。谁也不吭一声。

袁朴生心里有谱。此前他已经反复揣摩,他要做的第一款壶,应符合日本人喜爱的风格,既体现汉唐风范,又与日本人的审美及饮茶习惯相吻合。与之前的壶相比,不必那么精细,因为他发现日本人喜欢做工粗糙的东西,他们认为那是“天然”。所以,茶壶的造型须极简练而不事繁复,装饰手法亦应朴素简洁,因为日本人崇尚自然,不喜欢精细、花哨的装饰。早就想明白了,要做的第一款壶,应是可以用来冲泡玉露茶的那种小巧的急须。颇似南方广东、福建一带喝功夫茶的那种小型壶具。这里的人,把小壶称为“水滴”,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小,就像文人磨墨时用来添水的那种小瓶一样。袁朴生知道,在日本,所谓的玉露茶非常稀少而名贵,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用小壶来泡玉露茶,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

壶不妨小,但不可局促而小器;粗糙倒是不妨,但袁朴生的“粗糙”实际是一种更讲究的古拙与随意。那是注入了一种古拙意念的功力,最终是苍古的拙而不陋、天然疏放的效果,经过窑火的修炼,它一出世仿佛就有了几百岁的年纪。

那壶,已经在袁朴生的心里呼之欲出了。

100多种工具整齐地排列在泥案上。袁朴生开始了。使用那些工具,袁朴生连看也不看,信手拈来的程度,颇有表演技艺的意味。人们只觉得他修长的十指如同着了魔似的在灵动旋转。起先空气里有些躁动,慢慢地,便归于逸静,之后便是空谷俱寂般的安谧。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鲤江高寿给袁朴生送上一杯水,被袁朴生手臂轻轻一挡,水杯摔在

地上,发出清脆的碎响。袁朴生却如入定之人,毫无反应。惠子赶紧拿着扫帚过来,被哥哥挡住了。说,走开!

起先,老三岛气定神闲,稳坐在一把藤椅上,如同一座老式座钟。后来,忍不住几次站起来,走到袁朴生跟前,瞪大了一双昏黄的老眼,看着袁朴生娴熟的手法,不住地赞叹道,要西!要西!其他几位长老交换着眼神,小声嘀咕着什么。空气里嚶嚶嗡嗡的,仿佛一股沉闷的气流在涌动。

袁朴生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毫无察觉。古子樱轻轻地在父亲耳边说,他完全入定了。老三岛感叹说,为什么他不是日本人呢!古子樱

吩咐并没有走开的意思,把那柱香点燃了吧。

当一柱香烟袅袅上升的时候,袁朴生像从梦中醒来,他长长嘘出一口气的声音仿佛从天外而来。急须!急须!当一柄气脉灵动的小壶慢慢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禁不住围了上来。老三岛有些激动,说:这才是具有日本气派的急须啊!其他几位矜持的长老也不住地点头称是。袁朴生不慌不忙从腰间解下一枚鸡血石印章,将壶底朝上,取过檀木小榔头,欲将印章打在壶底。

师傅且慢!古子樱走到袁朴生身边。他双手托着一个檀木印盒,盒盖上镌着一朵精致的樱花。说,师傅,徒弟给您刻了一枚图章,您若看着合适,就用它盖印吧。

袁朴生打开印盒,细细一看,神态便有些愣,道:常滑朴生?我袁某何时就成了你们日本人了?古子樱解释道:师傅,不是这个意思。您这是在常滑制的急须,为了跟您在国内的壶有个区别,仅此而已。

老三岛在一旁道:你们清国有句俗话,叫入乡随俗嘛。

国壶

徐风

